

导 论

九十年代语境中的现代诗学建构

一般而言，诗学建构指的是对文学史的梳理、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文学批评实践，特别是指在以上几项工作基础上的反思性研究活动。本书所言诗学建构，限制在一个局部范围，即指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现代汉语诗歌领域的上述研究活动。

现代诗学建构的理论探索活动，在九十年代文学语境中显得十分活跃。一方面，研究者大都主张，将九十年代诗歌放入五四以降中国新诗现代性历程中考察，不再简单地把它当作“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去言说。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对现代诗歌理论批评、思潮流派、代表诗人等研究的深入，体现在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及由此生发的问题意识，且常常落脚于理论形态、批评形态的建设，以期澄清长期困扰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些问题。有论者把九十年代中国大陆诗歌写作与出版的繁盛景象，列入这一时期文学风景线上十个热门话题之一，并特别指出：“令人注目的是诗歌史和诗学理论建设取得公认的实绩，诗学明显走在小说学、散文学的前面，并给予后者影响性的启迪。”^① 这

杨匡汉：《多种途径和选择的可能性——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总序》，见刘王杰：《走向边缘的诗神·总序》，8—9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个判断有些片面，本书并不赞同。^①但如果将论者所言“诗歌史和诗学理论建设”，限定在现代主义诗歌史和现代诗学理论范围内，则是可以成立的。

以下从现象与观念两个层面，具体说明九十年代现代诗学建构的活跃，及其触及的若干问题。

一 现象层：现代主义诗歌与现代性研究的状况和问题

在现象层上，九十年代现代诗学建构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显著。

九十年代诗学（狭义）研究的显著特征，是从以往的诗歌“通史”（如“中国新诗史”一类）研究，转向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现代性诗歌思潮的“专史”研究。仅九十年代以来内地出版的这方面的论著就有：谢冕《地火依然在运行——中国新诗潮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蓝棣之《现代诗的情

诗歌“滑入低谷”说虽是浮泛之辞，但断言诗学“走在前面”、“有影响力启迪”云云，未必是切中肯綮之谈。因为：（1）九十年代诗学（狭义，下同）研究的显著特征，是从诗歌“通史”研究转向“专史”研究。详见下论。（2）如果着眼于文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诗歌史明显受小说史研究的启发，后者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等。（3）诗学与“小说学”、“散文学”的互动关系，须分层辨识。就关注并借鉴后现代理论、反思现代性而言，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共同受到后现代哲学理论的影响；就文学文体理论建设而言，诗学至少落后于“小说学”；就文学观念在不同文体研究间的传播和介入程度而言，有前者启迪后者的一面（如“个人写作”“汉语性与本土写作等”）也有后者启发前者一面（如“民间意识”“潜在写作”等）（4）以九十年代诗歌批评实践论，远不如小说批评富有实绩（参见本书结语《建立现代诗歌阐释学》中的相关分析）

谢著使用的“新诗潮”是对“朦胧诗”和“古怪诗”概念的矫正，指的是新时期诗歌变革的潮流。由于该著是将新诗潮放在中国新诗发展、演变的背景下考察（尤见于上卷“纵向的考察”），也由于著者认为这一时期诗歌变革的内涵，“是从封闭性的文化性格向着现代倾向的转变”，其特征包括“时代性”、“现代倾向”和“开放体系”三点，故本书将它列在“专史”研究的开端。参见该书《中国新时期诗歌变革的潮流（代自序）》2—4页。

感与形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年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第二版），^①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等。如果加上研究其中个别流派、群体的专著，^②以及各类专题学术论文，则更为丰富。

上述论著大体可分为两大研究类型、三种结构方式。第一大类型是以史带论，着眼于史的梳理。由于对“现代主义诗歌”概念的理解有狭义、广义之分，这一类又可分为两种结构方式。一种将它限定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内，由其萌芽期论述到成熟期，如孙著等；一种将它从四十年代延伸至八十年代末的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亦称“第三代诗歌”），如陈著、罗著等。比较而言，前一种依文学史传统分期法，视现代主义诗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认为它是现代诗歌史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一脉。这种理解，是把“现代主义诗歌”当作特定历史时期产生和形成的文学概念，切合文学（诗歌）史自身的发展历程，研究对象明晰，不会产生过多歧异。问题在于，正因为研究者对它的基本脉络，代表性流派、群体，主要诗人的创作等问题，认识上并无太大差异，容易导致研究线索、内容、观点上的大同小异，难有创见。后一种无疑受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观的影响，表面上对“现代主义诗歌”取开放性姿态，但暴露的问题也更多。一则，前

著者另一部《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实为专题论文结集。第一辑为当代诗歌批评（归入现代诗歌理论），第二辑探讨现代诗歌批评理论的渊源与传统，第三辑附录现代诗若干理论术语。

如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罗振亚《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蒋登科《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等

者的问题在它身上难以避免。二则，既然取广义概念，缘何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跳过五十至七十年代，仿佛偌大时空内，“现代主义诗歌”在内地已销声匿迹。^①三则，九十年代诗歌的短暂历史证明，欧美由庞德意象派理论始，经象征主义、特别是后期象征主义发展，^②又被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诗人移植的现代主义诗学观念，依然在本土延续。尽管现在还难以预言，现代主义诗歌是否依然是未来现代汉语诗歌的主导形态，但它的巨大影响力（既来自本土的、历时的，也来自异域的、共时的）不会在短时期内消逝，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现代主义诗歌史”是否会变得像目下通行的“当代文学史”一样，在时间上无限期地延展下去？

第二大类型是史、论并重，或者说，更侧重于诗人论和文本解读；史的勾勒、描述为论夯实地基，又在论中显示史的轨迹。如蓝著自称“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诗人论和流派论”，特点在于“文本的独特解读，以及在解读基础上豁然贯通的对于诗人整个创作脉络的把握”。这样的整体把握首先要求有问题意识，“力求找出其创作的某种同一性，而不是千篇一律地描述其创作发展历程而已”，由此概括流派、群体的共性特征。^③蓝著第一辑以郭沫若、闻一多到牛汉、纪弦十一位诗人的创作实践及文本解读，作为对“现代诗的走向与脉络”的探讨；第二辑则集中论述现代诗从“新月派”、“现代派”到“九叶派”的三次浪潮。以篇幅论，两辑分量相当，但其偏向于诗人专论、文本细读的特点十分明显。相形之下，王（泽龙）著在理论构架上尤显匠心。全书上篇按时序探讨现代主义诗学的发展及其范畴、主张，中篇对应地遴选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废名，冯至、穆旦作个案分析，下篇综论诗潮发展论，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象征主义的

① 以狭义“思潮”论，这一阶段似可跨过；若以“史”论或“诗学研究”论，这种处理则令人费解。罗著虽然用五十至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诗歌作为填充和过渡，毕竟是著述上的权宜之计，且与其整体研究架构有冲突。

②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起源与演化问题，有不同说法。可参见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相关论述。本书这里着眼于现代主义诗歌。

③ 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新版自序》，1页，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关系，整体形成了“从诗歌理论探讨到文本创作研究，从微观剖析到宏观整体审视，从诗人定位评价到诗潮流变动向考察相互关联，又多向展开的研究体系”^①。其实，诗歌史论专著如何既有自成逻辑的史论构架，又有细致独到的诗人、文本解读，本不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重史论轻解读”或“史论胜于解读”这种常见的批评意见看似有理，却隐含着可以将史论与解读拆解开来的二元观思想。上述两种写法各有利弊，均非尽善。关节点在文本解读是史论的注脚，还是史论之所从出的依据。

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史研究，虽然不一定是以现代性为引导，也不一定是以探讨现代性在诗歌中的演变为指归，但是，这种由“通史”向“专史”的研究转向，这种由特定诗歌思潮和现象引发的研究热点，明确反映出研究者在逐渐摆脱以社会革命史、政治运动史为主导模式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外部研究”方式后，走向对文学、诗歌本体特征的“内部研究”。这正是现代性的鲜明表征，也是研究者反思、检讨既往研究偏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史、诗论史的结果。不过，由“通史”到“专史”，再到流派史以至诗人专论，固然体现着研究者由“宏观”向“微观”研究的重心转移，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实质性改观。主要体现在：

(1) 重视论著外在的体系性，忽略著者个人见解的独创性。这与治史者的学术态度、运思方式，也与学术研究、评价机制和出版导向有关。郑敏曾将写书者分为体系派和非体系派两类，前者强调全与稳，但因体系多因袭传统，即使资料翔实，论述清晰，也只能算一本“稳妥但没有多少创见的参考书”；食而不化乃至拼凑的等而下之者，“纯属学术次品”。后者更重发现，而非具体知识的系统排列。研究者不受前人体系束缚，先行深入“野外（field）”勘测，积深思熟虑的系列论文以为书。^②这与蓝著观点相当一致。发现、创见（非“与众不同”，或在章节上刻意编排出与前人著述的“差异”）之不易，可以

① 黄曼君：《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序》，见该书第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②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前言》，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从许多同类论著的全与稳中得到反证。某种意义上，在一时难见边界的情况下将现代主义诗歌史无限止拉长的倾向，其实是欲以“大全”来显示“不同”的著述心态的表露；是写书的“创意”，难称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创见。选择体系派或非体系派著述，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曾述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面临的抉择，“你要么追求描述的连贯性，不惜伤害某些文本，要么为照顾每一文本的特殊性需要而牺牲连贯性”^①。选择后者意味着研究者希望突破文学史的束缚，首先让文学文本在细读中变得生机盎然。诗史、诗论史研究者在体系性与独创性之间面临的抉择，庶几相似。

(2) 文本解读的薄弱。这与前一倾向是互为因果的：重视论著外在的体系性，导致文本解读始终不能占据中心，往往成为体系设计的“程序补丁”；解读文本的才能、天赋的欠缺，^②研究者个人的创见无从谈起。蓝著反对以所谓“诗无达诂”的相对主义掩盖解诗的误区，主张最好的解诗方法是“一句一句地解，一行一行地解，一句一行都不可跳过，只有这方法可以把任何一种风格的诗解通”^③。这与朱自清三四十年代力主的解诗法是一脉相承的，即解诗“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④。可惜，肯用这种笨办法、肯下这种笨工夫的人不多见。

(3) “当代意识”的缺乏。新诗史研究如果缺乏对当下诗歌写作和理论批评的关怀，甚或与之脱节，其生机和活力何以体现。有论者说，新诗史研究的困难，并不完全在于材料搜集、辨析等基础性工作，而在于激活研究“冲动”的“立场”的确立方法，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是否有拥抱、把握当前诗歌状况、趋向的兴趣和能

①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导言》，王柏华等译，1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蓝棣之认为，解读诗歌需要天赋，它“指感受力、领悟力，在感受基础上想象并建立理解的能力”，通过后天的培养或训练可获得。但即便如此，“比仅仅拿一种理解与方法来装饰自己要困难得多”。见《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自序》，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自序》同上，1页。

朱自清：《新诗杂话序》，5页，上海，作家书屋刊行，1947。

力。^①

倡导深入研究中的发现、创见，不是否定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只是说，新诗研究者不仅应该积极吸收有关文学史学讨论中的新观念，从更高的学术抱负而言，还要以自己的努力拓展、更新文学史的观念。换言之，研究者不能再满足于在文学史论者给定的框架（哪怕是最新的）内作诗史专论，最理想的是用诗史专论来寻觅文学史论的死角，发现其中因研究视域的偏向而被长久遮蔽的东西。

上述问题是针对现有研究格局提出的。此外，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还有以下维度值得考虑：（1）从现代语言学角度入手，考察现代主义诗歌语言形式的演变。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被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人文学科诸多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研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借助现代语言学思想，可以使目前单纯的文体语言研究，上升到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主体言说，语言与情感、想象、虚构等的全面审视。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去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是说在语言学理论的启迪下，诗歌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包括对文本的解读，会得到更有力的体现。这种研究如果能与现代汉语诗学理论的探讨相结合，将会为现代诗学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②（2）从“宏观”到“微观”研究的确是一种研究方式的转变，但是，一些能够体现现代诗歌、尤其是现代汉语诗歌的诗性元素，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如诗中的时间与空间，想象与虚构，象征与隐喻，自然、荒野与城市，孤独、怅惘等心理的语言呈现方式等等。这些问题在既有研究中，往往作为某一诗潮或某些诗人的创作特征出现，没有被当作现代诗歌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内核进行单独解析。这方面西方学者、理论家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二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现代性的确认。

参见子诚：《“重写诗歌史”？》，载《诗探索》1996（1）。

吴晓东曾提出，研究现代汉语如何从根本上制约中国诗歌艺术形式、审美机制，以及诗人在文本中透露出的心理文化体验的探索，对现代汉语诗学建构至关重要，包括研究现代汉语的物质因素、诗性程度以及集体无意识等几个层面。参见《期待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汉语诗学》载《诗探索》，1996（1）。有关现代汉语与新诗语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5）。

现代性的引入是建构现代诗学的理论前提。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界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受到文学史界、文艺理论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并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形成呼应。有学者认为，理论界对现代性抱有极大的热情，不仅是因为其新颖的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功能：一是呈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可以包容更长的时段；二是具有理论上的中性色彩，涵盖面更大；三是为理论的融会贯通和学科的综合互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①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而言，现代性具有更为独特、丰厚的价值和意义。它内含的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精神品格，与“过去”决绝告别与断裂的激进立场，相信未来即进步的坚定信念，既与新诗诞生的历史情境极其吻合，也与它近百年间跟随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相一致。对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反思与批判，可以打破现有研究格局与方法单调、重复的僵局，为新诗研究及批评提供新的理论方案、话语形式。王光明认为，包括“新诗”在内的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寻求思想和言说方式的现代性运动”，故有“现代汉诗”一说。它“同时面向美学和语言的现代重构，以现代美学、语言探索的代际特点，体现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差异和延续的关系”。^②

现代性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也不是一个从未被关注的全新理论，它对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渗透，一直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以往的新诗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现代性是“新诗”“现代诗”“现代主义诗歌”这些概念和命名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相反，将这些概念和命名纳入到现代性框架中去重新审视。^③也因此，对现代性的阐述只限于局部问题的讨论，不是作为研究新诗发展的贯穿线索。现代性研究在九十年代文学语境中舒卷风云绝非偶然，是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阐释，其目的如前所述，是为了对新诗作整体观照，并

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载《文学评论》，2002（6）。

②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7—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唐晓渡认为，五四前后直至七十年代末，除用以称谓“现代诗”派，中国大陆很少使用“现代诗”一词，认为“新诗”一词已自然而然地涵括了“现代性”，因而常互换使用，沿袭至今。参见《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见《唐晓渡诗学论集》，21页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为此寻找新的理论起点。所以，对新诗现代性的确认是为了重新确立新诗的评价标准，解决以往研究中积存已久的困惑。如臧棣认为，如何评价新诗始终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的一大难题，而运用现代性的框架，也许是目前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可靠的途径，“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的历史”。现代性的基本特点之一，即它的评判标准是由其自身历史提供的，是一种自我评判，因而，对新诗的评价及其尺度、标准，应当从新诗的现代性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所形成的历史中来挖掘，无法外求。^①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对某一理论有“先入为主”之见。就二十世纪知识形态的总体特征而言，理论总是一种“发现”或“发明”；同时，一种新的理论，总是使在原有理论之上呈现的“历史事实”变得陌生和新奇。意大利学者雷纳托·波吉奥利（Renato Poggioli）说，“发现（trovata）”不过是“对以前尚不存在的某物（quid）的发现”，而文化史上一切“发现”的特征就是：“客观现实与对此一现实的主观意识相一致”。^②所以，赋予新诗现代性内涵，可以使研究中的诸多难题得到重新阐释的可能；这种重新阐释是否合法、有效，也将一并进入现代性框架内，接受持续不断的质疑和批判。现代性的独特魅力，或许正在于此。

具体来说，引入现代性后，如下涉及新诗评价的一些关键问题，会被再度审视：

（1）新诗与传统问题。如何对待新诗与传统的决裂，新诗是否应该、又以何种方式从传统中吸取营养，是新诗研究中争执未休的问题，关乎研究者对新诗的总体评价及其对流派、群体、诗人的定位。现代性为重新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尽管从同一立场出发，不同研究者也会有不完全一致的见解，但观察视角的转变，使人们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一些新的观点值得深思（详见下论）。

（2）新诗语言问题。新诗对传统的反叛，是从放弃文言文改用白

参见臧棣：《现代性与新诗评价》，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437—43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意]雷纳托·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周宪译，载《问题》丛刊第二辑，1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话口语开始的，经过尝试阶段后逐步形成新的语体，又在具有欧化色彩的翻译语体的影响下，确立了比较成熟的现代诗体式。九十年代以后，“现代汉语诗歌”（亦简称“现代汉诗”）概念被再度提出。在诗歌前添加“现代汉语”这个前缀，当然不是故弄玄虚。它提醒人们注意，现代汉语确立与规范的过程，一开始就融入了翻译语体的因素；并且翻译语体对现代汉语的渗透、转化现象，在今天越来越彰显，也越来越引起诗人的警觉。其次，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光大汉语言自身的特性，并使本土文化传统在其中得以呈现，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再次，对诗人而言，历史悠久的汉语言有其自身携带的某些本质性规定，先于诗人而存在。汉语言的本质性规定有哪些方面，汉语诗人对此是否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是每一位自觉、严肃的写作者不能不认真思考的。对新诗语言亦即汉语言的再认识，最终导向的是对新诗与传统——汉语言文化与古典诗歌形态——关系的再体认。

（3）新诗史的重写和诗人的再评价问题。九十年代新诗史研究，曾经受到两次文艺理论研究热潮的影响。一是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学本体论研究热潮，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理论的迅速传播、接受为代表。它推动新诗史研究的转向，现实主义诗潮及其诗人研究相对此前则冷落了许多。二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观的提出。除了上述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中时间下限的延展，或将某一专题研究（如朦胧诗、后朦胧诗）放在二十世纪诗潮史中考察，另有一些诗歌“通史”，也在力图打通原有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相分裂的研究格局。这些在新的文艺理论观念支配下的重写新诗史的努力，也存在着一定缺憾。首先是不能很好地将新诗史上不同流派、不同创作风格和价值取向的诗歌，真正融入一个整体来看待，许多情况下，重写只是调整了研究对象，偏移了研究中心。特别是，研究者在面对不同研究对象时，会采用双重或多重评价标准。其次是如前所述，在打通既有格局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制造了新的“断层”，研究者也似乎未觉得这有何不妥。如果回过头去再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其中原已凸显了现代性的义蕴。这一概念的要义，不仅在于要打通彼此隔膜的“断代”格局，而且要打破“内容”与“形式”

研究的二元结构；不仅是把“现代中国文学”看作一个连续性演变的整体，更强调在其中折射的现代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时代特征。^①

因此，以现代性来观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诗史的再度重写已不可避免，^②并将触及以下各个研究层次：（1）由“专史”研究重新回到“通史”研究，^③但不再像过去，依据某个阶段所谓“主流/次流”“重要/次要”“显层/潜层”一类的对立来描述历史面貌，而是紧紧围绕诗人在现代性追求中的指向和贡献来取舍评判；（2）在“断代史”如“当代诗歌史”中，现代性在文本中的复杂性、多样性将得到充分的注视和揭示；（3）跨时代的，尤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矛盾、彷徨的诗人及其文本，将会受到研究者的特别注意。

二 观念层：全球化语境中本土意识的强化

对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热衷和对新诗现代性的确认，只是现代诗学建构的现象层；这一研究所积累的经验，包括暴露的症结，为新诗现代性的确认提供着理论资源，也为将现代性引入新诗研究铺设了道路。现代诗学建构当然不是始于九十年代，但是没有现代性作支撑，这种建构很难有稳固的理论立足点。同时，引入现代性，是为了寻求解决本土诗学研究问题的途径。

就观念层来说，九十年代现代诗学建构体现出在全球一体化趋势

① 黄子平等认为，提出这一概念不单是打通现有研究格局，是要把它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它是指“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的进程”。这些观点与现代性研究的目的、范围、功能和意义相当一致见《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5）。

② 也有学者认为，从严格的史的定义来看，至今尚未诞生一部较全面系统，且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中国新诗史著作。因此，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重写”，而是“写”参见子诚：《“重写诗歌史”》，载《诗探索》，1996（1）。

③ 王光明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已明确体现出在新的世纪，以现代性为引导，新诗研究重回“通史”研究的迹象，以及研究者更高远的学术抱负。

加速的文化背景中本土意识的强化。

1. 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与传统的断裂。

九十年代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主的新诗史研究,在看待新诗与传统关系上的立场、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即研究者一方面在还原历史情境前提下,对新诗先驱者决裂于传统的言行表示理解,对其中复杂性因素也多有体察;另一方面,在反思这种历史状况时,一般又突出新诗与传统若即若离、似分似合的联系。例如,有论者通过新诗的意象所传达的“传统文化心理意识的积淀”,阐述两者的内在关系,认为比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诗歌与古典诗歌传统的联系更深厚。^①这种认识饶有兴味,只是诸多论者大体相似的运思方式,造成认识上的雷同,鲜有突破。相反,虽然同在现代性视域下,不同研究者对新诗与传统关系的认识,却并不完全一致。如有持“断裂”说者,认为与新文化运动一体的新诗革命,既是社会—文化危机及其催生的生存焦虑的产物,也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文艺中表现出的极其强烈的“革命热情”非常相似。因此,新诗的“全盘的反传统主义”是现代性的深刻体现,可称为“世纪标志”,符合哈贝马斯(J. Habermas)有关现代性所依靠经验的判断,构成新诗“合法化”的内在依据。^②另有论者则反对“断裂”说,认为正是由于新诗过于激进的“断裂”立场,才导致自身的危机,并波及现在。最有代表性者如郑敏,从解构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入手,认为新诗将自己与传统毫不留情地一刀两断,是二元对立结构的思维产物,贻害无穷。她的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论文,都在检讨这种“断裂”造成的恶果,主张新诗应当积极从古典诗歌中汲取养分,以弥合那条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观点曾在学术界引发广泛争鸣。李怡则认为,依据对“断裂”的判断作出的重新接通古典与现代的观点,十分可疑。反传统并不等于传统的中断,因为传统本身不是可以任意割裂又任意接通的。只要存在对传统的“误读”,就有传统的不断生长。^③这种观点明显受到艾

① 参见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② 唐晓渡:《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见《唐晓渡诗学论集》,20—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③ 参见李怡:《传统误读中的生长》载《诗探索》,1996(1)。

略特(T.S.Eliot)对传统与个人才能关系认识的启发,表面上反对郑敏似的主张,实则两者意见并不相左。^①臧棣同样不赞同“断裂”说,但也反对认为新诗的发展取决于它对旧诗的“创造性转换”,更反对把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作为一种模式对待。由于二元对立结构实际上是现代性思维的特点之一,他没有简单地予以否定;反之,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结构存在,传统才被纳入到现代性框架中,成为现代性开放性观念及其实践系统的有机组成。因此,新诗对传统的反叛只是一种表象,它“只是在现代性为它设定的实践空间内,拒绝了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拒绝了传统用它自身的审美范畴逾界来衡量自己”。^②这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由于融合着对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如叶芝、艾略特等写作实践的考察和分析,更具思辨性,对新诗研究也更有启发。

2. 提出“现代汉语诗歌”概念,研究诗歌的汉语性问题。

“现代汉语诗歌”的提法最早起于哪篇文章,已难以考证。^③可以肯定的是,将它作为一种诗歌形态或诗学概念加以理论探讨,是在九十年代。^④从白话诗——新诗(狭义)——现代诗——现代汉语诗歌(现代汉诗)^⑤称谓的改变,可以看出在现代性,包括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启示下,研究者对新诗语言的认知与评价方式有了转变。

郑敏在《企图冲击新诗的几股思潮》中同样援引了艾略特的观点载《文学评论》,2001(6)。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评价》,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445页,441—44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986年四川青年诗人万夏、石光华、宋炜等编印的一本内部诗集名为《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6年卷》(共编印两期),可能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提出“汉诗”一说的。参见杨黎著《灿烂》,221—222页,416—417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另,1991年出现过名为《现代汉诗》的民间诗刊。

除相关论文外,1997年7月曾在武夷山召开国际性“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主题,研讨重点涉及现代汉诗的诗学难题、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现代汉诗与中国诗歌传统、现代汉诗的现状与前景等详情可参见王光明《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反思》一文,载《文艺争鸣》,1998(2)

⑤ 美籍华裔学者奚密(一名 Michelle Yeh)把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称为“现代汉诗”,认为这个概念既可超越(中国大陆)现、当代诗歌的分野,又超越中国大陆与其他从事汉语诗歌创作地区的地域上的分野。见《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注,载《中国研究》,1998(9)。

不能说以往新诗研究中不存在这些观念，但总体上是在文学语言的范围内作语言形式的分析，如语言构成方式，意象结构，隐喻、象征、暗示、反讽等修辞方式，以及语体风格等等。由于现代性具有最大限度地拓宽文学研究边界、趋近文化研究的功能，此时的语言问题由文学语言转向文化语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被推到了前台。郑敏提出的重新阐释古典诗歌传统、确立新诗自主权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语言与传统文化无从割舍的内在联系。她从文化角度考察诗歌语言，借鉴了二十世纪后期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解构主义语言思想。粗浅地看，这好像是在要求今天的诗人学习和运用古典诗歌语言的形式“规则”；究其实，她认为，语言形式的内里有着深不可测的、一个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和审美意识，摇曳着其心灵之火，维系着文明的传承与发扬。相对其他民族语言来说，汉语诗歌受文化传统及语言本身规则的“限制”尤为明显，汉语诗人应当了解、尊重、“倾听”这些先于他而存在的“限制”“随心所欲而不逾规”。^①可以说，立足诗—语言—文化关系而主张的新诗回归传统、破除与传统的森严壁垒的观点，富有创见。旅居海外多年的诗人杨炼则以“中文性”一说，驳斥所谓诗的“中国性”的虚妄。在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的生存境遇和诗人写作境界的理解上，他与郑敏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字是中文的基因，左右着整个语法关系、思维方式以至生存形态，并在两千多年的精心打磨中臻于完美，因此与其说“诗人写诗”，不如说“诗写诗人”。他强调的“中文性”，也是指两个层次上的文化个性，即中文相对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以及一位诗人诗作的语言相对于其他诗人的独特。“在中文之内写诗”，也就是在中文“活的传统”中写作。这种写作既囊括了过去、现在，也向“未知”敞开。丰富与深化中文性所达至的程度，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诗歌的标

郑敏：《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见《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3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准。^①此外，九十年代以来有关“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汉语诗歌语言中的伦理性^③等的讨论，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现代性视野对研究者重新认识新诗语言问题的启发。

3. 讨论诗歌写作的“中国话语场”。

“中国话语场”的提出，源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诗人诗歌的“误读”^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荷兰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等对中国当代诗人写作的研究，引起国内一些诗人、诗人批评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即：在以西方价值准则为中心的评判中，在本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西方后现代话语（即对现代性反思的话语）的双重压力下，当代中国诗人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个人写作的意义和自我的身份。孙文波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要求诗人写作时，必须考虑“汉语的现实”（即汉语的历史处境与当下状况的浑然一体）对诗歌语言的强制性控制机制，自觉划定写作的边界，而不是以随意的越界行为来标榜写作的自由。诗人应注意语言的“前控制”与文本最终的“有效性”的复杂关系。^⑤王家新则并不单纯地将“中国话语场”理解为语言行为，认为它有“历史语

杨炼：《中文之内》，载《天涯》，1999（2）。

^②“字思维”由画家石虎在《论“字思维”》（载《文论报》，1996—02—01）中提出。

《诗探索》辑刊1996年第二辑始辟专栏讨论，至1998年第四辑止，吸引许多学者、批评家参与。其间，《诗探索》编辑部1996年11月在京主办了有关研讨会。

如杨立华通过解读北岛短诗《黑色地图》，就诗歌汉语性提出如下问题：“汉语性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吗？汉语性是否与某种特定的伦理关切有关呢？汉语诗歌应该承载怎样的伦理品质，才算是有了汉语性的汉语诗歌呢？”文章虽未就此展开，其提示的汉语性与特定的伦理性之间关系的思路值得重视，已不再局限于在语言形式或规范的意义上去探讨汉语性。见《“陈”的力度》，载《读书》，2003（12）。

这里的“误读”是指西方学者由于以西方文化价值为中心，兼有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优越感，易造成对当代中国诗歌的曲解。如诗人张曙光认为，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实质性隔膜，西方汉学家对中国诗歌并不是进行“真正的审美”，总是希望诗歌“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固有的影像”。欧阳江河也以顾彬文章为例，指出其阅读并不是针对诗自身的阅读。以上分别见张曙光等：《写作：意识与方法——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对话》孙文波等编：《语言形式的命名》，3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欧阳江河：《另一种阅读》，见《站在虚构这边》，96页，1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参见张曙光等：《写作：意识与方法——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对话》，孙文波等编：《语言形式的命名》，3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境”和“话语实践”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在给定的生存、话语条件与文学的自由表达之间，在写作的文化承诺、道义责任与个人的自由意愿之间”反复形成的历史困境，是生成每一位诗人个人化的“中国经验”的土壤与气候；另一方面，只有勇于直面和承担这种无可逃脱的历史困境，诗歌写作才能“积极介入到目前中国的话语实践并成为其中富有变革、批判精神和诗性想象力的一部分”，恢复诗歌对现实的发言能力。^①

对“中国话语场”的探讨，与有关汉语性讨论密切相关。不过，“话语场”概念强调的是语言如何在现实处境中生成与增殖，不只是怎样辨识和继承语言的传统规范及属性。因此，提出这一概念的深层意义在于：（1）它祛除了八十年代普遍弥漫的让诗歌“走向世界”的幻觉，希望在汉语语言的属性和诗人置身的语境中，重新定位诗歌与世界的关系。这也表明，诗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写出优秀的汉语诗歌上。（2）它揭示了当代诗歌与意识形态既对抗又同构的怪圈，试图扭转第三代诗歌以来的非历史化诗学倾向，在“不纯”中增强诗歌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参见本书第一章的相关论述）。（3）面对西方汉学家的诗歌批评，国内诗人的态度由最初的新奇、不加质疑的接受，并视为一种“世界性”荣誉，转向对其“他者”身份及其“误读”保持警惕，进行对话。

4. “知识论”与“民间论”之争——多元化语境中诗人立场的分化。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之争，是九十年代的一次诗歌事件，本书有专章分析其中涉及的诗歌理论问题。双方交锋的焦点，实际上是关于“两种”诗歌写作谁更本真、更重要、更能代表九十年代诗歌的实绩和发展方向。由于“知识”一词被民间写作者赋予外来的、殖民化的含义，“民间”则被他们自己视为本土的、底层的，因此，可以将论争看作是后现代语境中诗人立场的分化。只不过，这种业已存在、也十分自然的分化，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对立方式释放出来。

参见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载《文学评论》，1997（2）。

先说“知识论”。民间写作者将知识分子写作理解为“知识的写作”，并认为它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① 指责知识分子诗人在“不着边际的字词迷津”和“玄学气质”中，“最终堕落为知识和技术的奴才”。^② 知识分子写作者则认为，将知识分子写作等同于“知识”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学“丑化”行为。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接受西方现代诗歌的有益成分，汉语诗歌语言本身就杂糅着翻译语体因素。今天的情形更是说明，没有人能逃脱这种历史宿命而宣称自我基因的“纯正”。此外，现时代的人类活动都以知识的方式体现，诗歌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或知识实践；诗歌的“非知识化”指的是摆脱对现代知识的依附，维护想象力对存在的描绘和解释，使诗歌成为独立于历史、政治、哲学等的知识形态。^③

再说“民间论”。民间写作者认为，民间立场指的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④，崇尚原创，要求诗歌回归原生态的大地，从“个人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生活细节中，发现“结实实在、充满人性气息的诗性”^⑤“诗歌在民间”“好诗在民间”诗歌的标准即民间的标准“乃是一个永久的常识，放之四海而皆准”。^⑥ 知识分子写作者则认为，民间立场强调的独立、自由、创造的品质，对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关注，是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先锋诗歌的共同特征，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以日常性、以对个人生活经验的直接体验和表达作为诗歌价值判断的绝对标准，势必取消当代诗歌的多样性发展。“民间论”实际上是新诗史上要求诗歌以“民族性”来“大众化”的老调重弹。民间诗人再次以渲染知识分子诗歌与所谓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见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谢友顺：《诗歌与什么相关》，载《诗探索》，1999（1）。

参见臧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载《文论报》，1999—07—01。

韩东：《论民间》，见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46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谢友顺：《诗歌与什么相关》，载《诗探索》，1999（1）。

⑥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见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9页，1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